

少将符确坚： 最深的牵挂， 凝聚在战火纷飞中

文 | 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



符确坚(中)和战友们在一起。

离开队伍到卫生部治病。然而，在疗养期间，这个“一刻也闲不下来”的符确坚又主动请缨负责民运工作，克服种种困难，出色地完成打前站、搞粮草、找民伕等工作。

据符确坚回忆，父亲生性勤奋好学，还写得一手好字，也正因此才被安排在中央财政部文书科做缮写工作。哪怕是在长征途中，符确坚也没有忘掉自己的本职，白天跟着队伍急行军，夜里当筋疲力尽的将士们倒头昏睡时，他又点起一盏昏暗的小灯，强忍困倦誊写文书战报、镌刻印刷钢板。常常刚把手中的活计做完，天就已经亮了，一夜没有合眼的符确坚又得跟着队伍向前开进。

其实，这些苦，对于早就过惯了苦日子的符确坚而言并不算什么。

1906年，符确坚出生在海南文昌的一个贫穷村落，等待他的只有苦难——家里没有一分田，半分地，除了一间栖身的破屋之外，只有四斗米。他的父亲凭着一身力气，起早摸黑，拼死拼活地为别人挑担、推车，直熬到他8岁时，家里才有点些许积蓄。

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，1922年，符确坚就去给做生意的姑父当伙计，凡记账、收货、收债、煮饭等一切杂事均由他一人负担。性情暴烈的姑父将他当作奴仆一样看待，除了给口饭吃，工钱不给半分。后来，为了养活一家人，19岁的符确坚又飘洋过海去了新加坡找到了一份零工来做。可展现在他面前的同样是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、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、工头的任意罚打与辱骂以及工友们的愤怒与反抗。

天下这么大，为什么穷人这样难活命？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符确坚，让他开始丢掉幻想，和愤怒的工友们一起举行游行示威，开展罢工斗争，还参加了赤色工会、互济会、反帝拥苏同盟等革命团体，进入工人夜校学习，渐渐懂得不少革命道理的他领悟到，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剥削正是广大人民贫困的根源，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跟着真正为人民谋利的共产党走才有出路。在更加积极参与革命、主动寻找共产党组织之后，符确坚

在1927年秋天入党。

“那一刻，父亲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孤身奋斗的志士，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，他终于迈出了革命生涯中坚实的第一步。”符确坚说，同时，符确坚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因为他知道，革命要想取得胜利，要吃的苦还多得多。

弥留之际不忘革命信念

“从刚记事的时候开始，父亲就常常讲起长征中的经历来教育我们。”符确坚还记得，每当他们兄妹几人犯了浪费粮食、做事拖拉等“小孩子总爱犯的毛病”，符确坚就放下平日里慈父的模样，“比如看到我们剩下饭菜，他就严厉地告诉我们，在长征途中食粮短缺，吃草根、树皮是常有的，最苦的时候把裤腰带、皮鞋帮子都割下来煮了吃，今天这样的白米和肉菜是想也不敢想的。”

吃树皮、草根、裤腰带，这样的场景今天还可在许多描写长征的文学、影视作品里看到。可这些在我们看来有些“戏剧化”的场景，却给符确坚的生命留下了深刻而真实的疼痛。因为长时间的饥饿，他的胃部不堪折磨，落下了病根，最终不得不手术切除了五分之四。也正因肺病与胃病的双重夹击，他的身体在长征之后大不如从前，在文化大革命的蹂躏下早早含冤离开了人世。

“即使走到了生命的尾声，父亲也没有发过一次牢骚，泄过一次私怨，而是始终相信群众、相信党、相信共产主义。”符确坚说，在符确坚住院时，还经常与病友谈心，亲自安慰那些被造反派“揪斗”的干部。直到弥留之时，他始终坚信，他的伟大祖国终将迎来重生的曙光。

令符确坚至今痛心的，是当时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下的符确坚呢喃的那些话语——“地图挂在墙上，要用手电筒照着看……手电筒啊，就在墙上挂着的挎包里。”除了这些支离破碎的句子，符确坚没有给家人留下更多嘱托。他一生最为牵挂和不舍的岁月，早已凝聚在那片战火纷飞之中。

云广英：

又“苦”又“走运”

文 | 海南日报记者 苏庆明



云广英、陈英夫妇和在延安出生的云奋荣、云胜廖。

在参加长征的几名海南籍干部中，文昌人云广英（1905—1990）有关长征的史料记录极少。其本人也很少跟人口述这一经历。我们从其后人口中仅仅了解到，他对长征感慨最多的，是自己比较“走运”。

云广英于1905年11月出生在文昌市会文镇朝奎村。原名云昌旭，曾用名云清、林秀生（1937年4月周恩来为其改名云广英）。他于1924年考入广州广雅书院，在校期间参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。1927年“四·一二”政变后，逃亡至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。1929年回到广西参加百色起义，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0年9月后随红七军从贵州向江西中央苏区进发，转战5省，与中央红军会合后，编归红三军团，任该团一师二团政委，参加第三、四、五次反“围剿”。

笔者查阅资料得知，1934年10月长征前夕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（简称中革军委）决定将苏区的4所学校合并组成干部团，由陈赓担任团长，辖3个步兵营、1个特科营、1支上级干部队伍，共1480余人。其主要任务是护卫党中央和军委机关，为部队储备、培训和输送干部，必要时参加战斗。

云广英就处在干部团队列中，为干部团教员。笔者采访云广英之子云奋荣时，其说，父亲很少跟他讲革命经历，说自己的长征经历只说“在长征中最走运”，因为“不用打仗”。

这一说法值得辨析。

一方面，这用于云广英的个人经历应当是大体适当的；另一方面，就整个干部团的情况而言，则失之精当。综合两个方面，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对比性的描述，其中掺杂了个人的脾性和历史感慨。

从“干部团”这一命名及其承担的任务可知，其保存自身的任务远远大于打仗的任务。根据父亲的说法，云奋荣提及干部团成员时，首先列举的是上了年纪的老干部、一些妇女同志（如干部的妻子）。可以明确，这些人是没有打仗任务的。云奋荣介绍，云广英在解释自己不用打仗的原因时，还补充说明因为自己属于文职人员的一类。因此，干部团中部分人没有打仗的说法应可成立。

但相关资料也显示，干部团并非没有参与战斗。长征初期，干部团参战机会不多，但湘江战役损失惨重后这一队伍便在战斗中崭露头角，在遵义会议后的几个严峻关头，分别参加了与国民党郭勋祺部、吴奇伟部的战斗，及在金沙江畔飞夺皎平渡一战，均表现出色。由此可见，起码部分团员是参加过战斗的。

云奋荣说，父亲后来并不喜欢谈论自己的革命经历，不写回忆文章，论及长征的印象，“只说过苦，跟别人一样爬雪山过草地煮皮带吃，能活下来很不容易”。既说“苦”，又说“走运”，即表明了“走运”的说法是就不用参战而言的。但也可能存在另一种情况，其“没有打仗”并非绝对没上过战场，而是其认为相对别人的身经百战，自己打的那几场实在算不了什么，因此在不追求严谨的个人性口述及不喜欢夸饰的个性作用下，说成没有打仗。

1935年10月，云广英随团到达陕西瓦窑堡，随后任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长。其个人又“苦”又“走运”的长征到此结束。